

中国价值观念网络的变迁（1990—2018）^{*}

田 丰 吴锦峰 王杨聿

提 要：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普通人的价值观念？多数学者认为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但部分学者也认为随市场转型可能产生价值观念区隔化或同质化。本文基于1990—2018年的6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构建价值观念的整体网络，从观念连接强度、社群结构特征和结构因素的解释力三个维度测量观念网络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和稳定性并存的特征。多元化体现为观念连接的强度下降，社群数量增加和头部社群的占比下降，性别和阶层等结构性因素对网络结构的解释力不变甚至有所下降，但结构性因素中教育程度的解释力有所上升。稳定性体现在中国人在工作与家人关系、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上的价值观念基本稳定，仅在价值判断上出现政治理念和个人成就的分离。综上所述，从1990年至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总体上基本稳定，并呈一定的多元化趋势。

关键词：价值观念 整体网分析 趋势分析 市场转型 多元化 区隔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剧烈且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市场化和全球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造成了群体之间不同的生存境遇，这一点在学界已有一定共识（刘欣、田丰，2018；吴愈晓，2019）。那么，这些结构转型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现有研究发现，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政治价值观等多种价值观念已发生了变化（高海燕等，2022；胡洁，2020；李路路等，2012；李路路、钟智锋，2015；刘军强等，2012；许琪等，2020；杨明等，2011），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市场转型相伴的“文化转型”。

在阐述中国价值观念的整体性变化模式时，已有文献提出了多元化和区隔化两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社会学视角下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145；主持人：周怡）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内容曾在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论坛汇报，并获年会一等奖优秀论文。感谢梁玉成、范晓光、刘精明、郭小弦、与会同人及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个主要论断，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同质化的可能性。持多元化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市场转型，人们更加尊重个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对待各类社会议题的态度也更加包容（李路路、王鹏，2018；李路路、王元超，2020；王正绪，2012；王正绪、游宇，2012；周晓虹，2017）。持区隔化观点的学者则担忧价值观念的结构性“断裂”，即随着社会群体之间生活境遇的差异增大，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可能出现结构性差异，使得一方更难以理解另一方的态度和立场（闵学勤，2012；孙立平，2002），出现极端情绪人群（桂勇等，2015；黄荣贵等，2022）。持同质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日趋一致的教育体系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可能反而会趋于一致（蔡卫平，2008；韩洪文等，2012）。

尽管这些研究不乏洞见，但难以交互验证，这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学者对价值观念的选择不同，而对变化趋势的解读取决于所选取的价值观念，使研究结论之间难以相互比较。第二，基于多个价值观念的研究大多检验取值上的差异，忽略了价值观念之间的联系。文化社会学的价值理论指出，每个价值观念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价值网络的一部分（Boutyline & Vaisey, 2017; DellaPosta, 2020）。如社会信任、政治偏好、对生活方式的偏好等不同观念均是相关的，且在整体观念网络中占有一定的结构位置。也就是说，人们的价值观念差异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念的取值上，也反映在观念之间的连接方式以及所形成的网络结构上（Baldassarri & Goldberg, 2014）。

因此，本文用整体网的分析方法来构建中国的价值观念网络（Belief Network）并测量其变化趋势。下文首先对有关中国价值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趋势的文献进行回顾，再简述观念网络的基本分析思路，构建三个指标对价值观念网络的多元化、区隔化及同质化进行测量。接下来，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1990—2018年的6次数据，分析价值观念网络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整体上保持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呈多元化趋势。

一、中国价值观念的变迁趋势

价值观念指的是个人对于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领域中现象的文化诠释，体现了个人行动的动机或合理化过程（Vaisey, 2009）。广义的价值观念可以包括个人对

于社会现象的态度、偏好及评价等多个维度 (Lizardo, 2017)。在近些年来, 针对中国社会中价值观念的特征、变迁与后果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 (王俊秀, 2014; 杨宜音, 2006),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观念变迁过程已成为透视社会转型的另一种重要视角 (周晓虹, 2011)。

就对价值观念变迁的探索而言, 现有研究可分为对特定价值观念的分析与对整体性变迁模式的分析两种。前者从特定领域的价值观念出发, 分析随改革开放进程而不断演变的国民心态。比如现有研究发现, 在改革开放后, 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度和幸福感上升 (胡洁, 2020; 刘军强等, 2012; 杨明等, 2011), 更加在意社会公平 (李路路等, 2012; 许琪等, 2020), 更强调政府应以人的自由和发展为导向 (李路路、钟智锋, 2015)。

此外, 许多研究者关注整体性的观念变迁模式, 这也是本文主要的对话目标。这部分研究试图将关注点从各个分散领域转向整体变迁模式, 试图通过具有概述力的变迁模式来整合不同领域的观念变迁特征。其中, 多元化和区隔化是此部分研究的两个主要观念 (李路路、王鹏, 2018)。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同质化的可能性。各派的基本观点如下。

持多元化观点的学者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宏观变化, 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城市化的推进、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等, 使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更为多样, 进而使得价值观念的分布也更加多样化 (Wang, 2015)。与此同时, 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使得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 出现了价值观念的后物质主义转型 (Inglehart, 1997; Inglehart & Baker, 2000)。

多元化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比如, 王正绪等人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多轮数据的分析, 发现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使中国人的价值观更具有后物质主义的特征, 人们对各类社会议题的看法更为多元, 愈发能接受和包容与自己不同的群体 (Wang, 2015; 王正绪, 2012; 王正绪、游宇, 2012)。周晓虹等人 (2011) 在《中国体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一书中系统地比较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价值判断、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意向等观念上的差异, 也发现了更多元的价值取向。这种多元化趋势尤其体现在青年人中。如李春玲 (2015, 2019) 的研究发现, 包括“80后”“90后”和“00后”在内的新生代群体对生活方式、政治理念等方面的价值观念更为多样, 对各类少数群体的社会议题更具包容性。

与多元化的观点相对,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呈区隔化(或极化^①)趋势。伴随着市场转型,不同社会群体的客观生活境遇的差异增大,这可能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念朝着不同的方向变化,加大群体间价值观念的差异(闵学勤,2012;孙立平,2002)。例如,收入差异的增加可能在价值观领域激发以仇富、反精英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民粹主义(周庆智,2017),也可能促使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的感知上升(李路路等,2012)。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则提升了对妇女权益、家庭和生育等议题的社会关注度(计迎春、郑真真,2018)。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群体愈发持有基于自身立场的价值观念,更排斥有悖于自身立场的价值观念,形成区隔化趋势。

对于区隔化的担忧主要体现在关于网络思潮的研究中(黄荣贵等,2022)。桂勇等研究者(2015)基于微博用户的研究发现,尽管大部分网民未表现出明显的态度倾向,但网络平台上仍存在少部分愤世嫉俗、有民粹主义倾向等具有极端情绪的社群。这些极端情绪逐渐演化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观念谱系(Wu,2014)。其中,部分极端和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与民粹主义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以民粹型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小区隔(桂勇、黄荣贵,2020),甚至蔓延到了青少年群体之中(Liu,2019)。

值得一提的是,李路路等人的研究不仅支持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势,也驳斥了区隔化的论断(李路路、王鹏,2018;李路路、王元超,2020)。他们基于CGSS2005与CGSS2015两期数据的比较,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总体上更为包容,体现在对性与性别、个人自由等方面的观念更为开放,更加尊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世代、城乡和教育等结构因素对价值观念的解释力度下降。也就是说,人们的结构位置与价值观念的相关性减弱,结构性差异并未导致价值观念的区隔化。

除了多元化和区隔化这两个主流观点外,少数学者认为价值观念也可能存在同质化的趋势。比如,在传统文化遗产、统一的教育体系以及逐步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全体成员可能会形成统一化的价值观念(蔡卫平,2008;韩洪文等,2012)。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逻辑的推衍,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① 区隔化指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或群体身份对群体价值观念的预测力增强。社会极化为区隔化的子类别,即社会撕裂为持有对立观念的少数几个群体,且这些群体的观念仍朝着互斥的方向变化。

二、利用网络结构测量价值观念变迁

(一) 有关价值观念变迁的三种分析思路

关于价值观念的整体变迁模式，已有研究得出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但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这可能与分析方法的差异相关。本文将已有文献使用的方法大体归纳为三种。第一，用诸如后物质主义、社会包容度等代表性概念构建指标，描述价值观念的变迁趋势。比如，高海燕等（2022）用权威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概念构建价值观念的指标体系。李春玲（2015，2019）选取了如消费观念、社会宽容度、社会参与等指标来概括青年人的价值观变迁。第二，在构建代表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回归模型来检验价值观念与结构性因素间的相关系数。例如，李路路等人（2012）的早期研究检验了社会冲突意识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强相关性，近期研究探讨了世代、城乡和教育等多个结构性因素对价值观念的解释力度（李路路、王元超，2020）。第三，也有研究通过价值观念间的联系来探讨价值观念的整体变迁趋势，但这类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交平台上的文本分析（黄荣贵等，2022）。

本文认为，这三种分析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前两种分析方式需要学者事先选取用于分析的特定指标。他们的结论可能受到指标选择上的主观性影响，难以进行交互验证。这意味着，尽管他们想要超越特定领域的指标分析来获取整体性的变迁模式，但最终还是受限于指标选取的主观性。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用于概括价值观念整体变迁的代表性指标并不容易。例如，被已有文献广泛使用的后物质主义观念就受到了质疑。因其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有待商榷（张汇泉，2022）。其次，前两种分析方法忽略了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连接关系，这在下个部分将重点论述。最后，基于互联网数据的研究虽也采取了整体网的分析思路，但网络民意与现实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Nguyen et al., 2012）。因此，本文拟对问卷数据中的价值观念问题采用一种新的分析思路：通过整体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网络，利用网络结构特征构建测量指标，便于更好地检验价值观念的变迁模式问题。

(二) 价值观念的整体网分析思路

文化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认为，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DiMaggio, 2011）。比如，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度这两种价值观念并不是相互独立

的,认为社会公平的人往往会具有更高的社会信任度(张书维,2017)。因此,人们价值观念的差异并不只体现在单个价值观的取值上,也体现在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联系之中。基于这一思路,有学者使用关系类别分析(Relational Class Analysis)的方法识别了美国人的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模式(Baldassarri & Goldberg, 2014);也有学者利用因子分析或潜在类别分析的方法识别出中国社交平台中的不同价值组合模式(Huang et al., 2019; Pan & Xu, 2018)。

价值观念之间的联系会形成价值观念网络结构,因此也就可以用社会网络的方法进行分析(Boutyline & Vaisey, 2017; DellaPosta, 2020; Hunzaker & Valentino, 2019)。价值观念可视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Node),价值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联系可视为社会网络中的边(Edge),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可视为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连接权重(Weight)。通过计算这些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而建构和测量网络的结构特征。

相比于现有的三种分析方法,价值观念网络分析思路的主要优势是可超越对价值观念预先的主观筛选,直接将问卷中所有包含价值观念的问题纳入网络分析的框架中,从总体层面对观念体系进行把握,方便识别出价值观念的结构(Boutyline & Vaisey, 2017; DellaPosta, 2020)。进而,通过对不同时期价值观念网络结构进行比较,可为多元化、区隔化或同质化提供客观的测量指标(DellaPosta, 2020),系统性地解读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变迁。

(三) 三个测量指标

本文参照已有文献关于美国价值观念网络的分析方法(Boutyline & Vaisey, 2017; DellaPosta, 2020)及李路路等人关于区隔化的研究(李路路、王鹏, 2018; 李路路、王元超, 2020),构建三个网络指标来测量中国社会的观念变迁趋势。这三个指标分别为:观念连接强度、社群结构特征和结构因素的解释力度。这三个指标可对价值观念网络的多元化、区隔化或者同质化趋势进行区分(见表1)。

第一,观念连接强度测量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或者说,观念网络中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度。节点之间的关连强度越高,人们对不同议题的观点越相似(DellaPosta, 2020)。因此,如果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那么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会减弱,人们对不同议题的看法会越分散,更具有随机分布的特征(Baldassarri & Gelman, 2008)。相反,如果价值观念趋向区隔化或同质化,则观念之间的连接强度便会上升。

第二，社群结构特征测量的是价值观念的“谱系”变化趋势。观念网络的社群指在网络中形成的规模较小、内部连接紧密的价值观念子群体。社群结构特征常用观念社群数目和头部社群规模两个指标衡量。在研究美国价值观念的文献中，这被视为区隔化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例如，有学者通过对44年的美国社会综合调查进行分析，发现观念网络中的社群数目逐渐减少，最大社群包含的价值观念逐渐增多，趋于区隔化（DellaPosta，2020）。从社会议题上来看，不仅经济和移民等议题被划归在党派分野中，甚至连一些看似不相干的社会议题，如道德观念、养老、科学价值等，也被拉入了跟两党有关的政治观念中。同质化跟区隔化的思路相同。与二者相反，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可视为价值观念的碎片化，呈现社群数目的增加和社群内部观念数量变少的特征。

除了社群结构的客观指标外，我们还可以对社群内的价值观念进行描述和解读。例如，当统计数据显示社群数目增加时，可进一步研究观念社群内部是如何分裂的。通过这一方式，可与已有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对多元化的结论进行更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第三个测量指标为结构因素的解释力度。这个指标常被用于测量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Baldassarri & Gelman，2008；李路路、王鹏，2018）。如果结构性因素与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随时间而增加，则说明观念的分布更加结构化，价值观念呈区隔化趋势。如果结构性因素与各个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减弱，即缺少清晰的观念分化模式，说明观念的分布更为随机抑或是更加统一，呈多元化或同质化趋势。

综上所述，价值观念的不同变化趋势在三个指标上有不同的特征。如果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就意味着观念连接强度减弱、社群数目增加和头部社群规模变小、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下降。如果价值观念趋于区隔化，则意味着观念连接强度增加、社群数目减少和头部社群规模变大、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上升。如果价值观念趋于同质化，则意味着在观念连接强度增强、社群数目减少和头部社群规模变大、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会下降。

表1 多元化、区隔化和同质化在三个测量指标上的表现

指标	测量	多元化	区隔化	同质化
观念连接强度		-	+	+
社群结构特征	观念社群数目	+	-	-
	头部社群规模	-	+	+
结构因素的解释力		-	+	-

三、构建观念网络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 WVS) 的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包含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价值观念的相关问题,是目前所有公开数据中包含价值观念变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调查之一^①,适合用于构建价值观念的整体网络。本文使用在中国大陆地区收集的 1990 年、1994 年、2001 年、2007 年、2013 年以及 2018 年的 6 轮数据,这 6 轮数据均采用了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 抽样,以获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以 2018 年的抽样为例^②,调查团队将所有县级行政区根据经济水平划分为 6 类,并以 2010 年普查中的人口规模成比例抽取了 50 个县级行政区。随后,调查团队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在每个县级行政区内再次按规模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方形区域,并将区域内的所有房屋纳入抽样对象中。最后,在抽中的房屋中选取符合调查团队要求的,年龄在 16 至 70 岁间,且在该县级行政区居住六个月以上的调查对象。

(二) 构建价值观念的整体网

为了建构观念网络,本文将问卷中所有与主观态度相关的问题都纳入分析框架中。首先,我们依照阿尔文 (Alwin, 2007) 的分类方式,将调查中的题目分为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结构变量与如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等观念变量,保留后者用于网络分析。此外,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问题选项不一,大多以定序变量为主,但也有少部分以定类变量出现。因我们需计算观念之间的连接强度,故仅将定序变量,或可转为定序变量的价值观念变量纳入分析范围。

本文以 196 个价值观念变量为节点,以 14480 个变量对为连接,以每一个变量对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权重,构建出每一个年份的观念网络。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问题在这 6 轮中会发生替换,有一些问题仅出现在部分轮次中。为保证模型拟合的可靠性,本文仅保留了至少出现在两轮中的变量对,共计 196 个变量,形成 14480 个变量对。

① 具体信息可参考网站: <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Contents.jsp>。

② 中国大陆地区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历年由 Gallup-China、北京大学等不同机构负责,故历年抽样方式具有一定差异,此处以 2018 年的抽样为例,简单阐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代表性。

在整个6轮数据中,由于变量轮替,最后一共观测到45678个变量对,占理想变量对数目($14480 \times 6 = 86880$)的53%。对于年份中缺失的相关变量对,本文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使用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Multilevel Mixed Effect Model)进行插补(Baldassarri & Gelman, 2008; DellaPosta, 2020)。具体操作为,用能观测到年份的变量对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的绝对值^①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估计,并用估计值对缺失值进行插补。

(三) 结构性因素

本文选取了主观阶层地位、性别以及教育程度三个结构性变量,来考察结构因素的解释力。这三个变量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每轮数据中都有收集。其中,阶层地位是许多市场转型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李路路等, 2012; 刘欣、胡安宁, 2016; 刘欣、田丰, 2018; 孙明, 2009),学者们对社会冲突的担忧都与阶层地位和收入不平等有关(Whyte, 2010)。性别作为重要的先赋性因素,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Tian & Liu, 2018; 贺光烨、吴晓刚, 2015)。教育程度则作为重要的自致性因素,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直接且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观念(黄嘉文, 2013; 李颖晖, 2015)。具体的测量方式如下。

主观阶层地位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通过询问被访者的主观收入等级获得,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3个等级,本文以定序变量的方式加入模型。性别变量以二分变量的方式加入模型。关于受教育程度,不同年份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对受教育水平的测量并不统一,加之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绝对受教育程度的含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本文采用受教育程度的相对测量方式,即将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按4分位数(即25%)分为了4组,并按照教育程度从低到高依次赋值为1—4分,作为连续变量加入模型。^②

四、观念网络的变迁趋势

(一) 观念连接强度的变化趋势

为了测量观念连接强度的变化趋势,本文以价值观念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的

① 由于我们关心的是观念的连接强度而非相关方向,且考虑到后续社会网络建模的需要,在此对变量对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绝对值处理。

② 本文也尝试将教育程度编码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二分变量后加入模型,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绝对值为因变量,以时期为自变量^①,拟合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其中,观念和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嵌套于第二层次的每一个观念对之中,截距和时期的相关系数在每个观念对中都有不同的取值。公式如下:

$$\begin{cases} |r|_{jt} = \beta_{0j} + \beta_{1j}t + \varepsilon_{jt} \\ \beta_{0j} = \gamma_{00} + \mu_{0j} \\ \beta_{1j} = \gamma_{10} + \mu_{1j} \end{cases} \quad (1)$$

其中 j 为变量对, t 为时期,进而 $|r|_{jt}$ 表示的是在 t 时期可观测变量对 j 的相关系数。 β_{0j} 为随变量对 j 变化的随机截距, β_{1j} 为随变量对 j 变化的时期 t 的随机系数。 ε_{jt} 为扰动项,将变量对相关系数可能存在的变化纳入考量。

表 2 观念连接强度的多层次混合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固定效应				
截距	.0617 *** (.0005)	.0613 *** (.0002)	.0616 *** (.0005)	.0603 *** (.0005)
时期 (每五年)	-.0005 *** (.0002)	-.0004 *** (.0002)	-.0005 *** (.0002)	-.0008 *** (.0002)
随机效应 (标准差)				
截距	.0590	.0588	.0589	.0589
时期 (每五年)	.0089	.0088	.0089	.0087
BIC	-130160.1000	-130664.8000	-130225.7000	-131302.3000
样本量	43576	43576	43576	43576

注: (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2) 括号中为标准误。

表 2 是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的结果。模型 1 的结果显示,变量对的相关系数随时间显著减小,支持了多元化假设。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系数为 -0.0005 ,数值较小。考虑到时期的随机效应的标准差为 0.0089 ,说明有 95% 的变量对的时期相关系数落在 $(-0.0179, 0.0169)$ 之间。这一结果说明,大部分变量对的相关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基本保持稳定,仅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趋势。

① 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 (Baldassarri & Gelman, 2008; DellaPosta, 2020), 本文的时期变量以 5 年为 1 个单位, 用以测量一定时期的观念变化。变量的生成规则为时期 = (调查年份 - 1990) / 5。同时, 时期变量用均值进行了对中操作。

为了考察模型 1 中所发现的多元化趋势是否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模型 2 到模型 4 的结果分别为控制了阶层地位、性别以及受教育水平后的偏相关系数,重新拟合模型。模型 2 控制了阶层地位,模型 3 控制了性别,模型 4 控制了受教育水平。结果基本不变。也就是说,观念连接强度减弱这一结果是稳健的,并不会因为社会阶层、性别和受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因素差异而改变。

(二) 社群结构特征的变化趋势

1. 社群数量和规模的变化

本文使用鲁汶(Louvain)算法对每轮调查的观念网络进行了社群侦测。鲁汶是基于模块度(Modularity)的算法。这一算法初期将每一个节点视为一个社群,然后迭代计算每一个节点进入其他社群后的模块度增益,继而将节点归入模块度增益最大且为正的社群,从而形成最终社群的侦测结果(Blondel et al., 2008)。与其他算法相比,该算法在效率和效果上都表现得比较好,识别出的社群往往呈同一社群内部节点连接比较紧密、社群之间连接相对稀疏的特征(Smith et al., 2020)。在进行社群侦测后,我们继而计算了各年份观念网络的社群数量与头部社群的规模。^①

图 1 报告了社群结构特征在 1990—2008 年的变化。首先,社群数量从 1990 至 2001 年稳定在 4 个,在 2007 年上升至 5 个,在 2010 年后上升并稳定在 6 个。这说明,价值观念的分布趋于分散。与上文的连接强度所得到的结果一致,支持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假设。

图 1 中头部社群占比这一指标,是用来测量社群规模变化的。头部社群规模测量的是规模最大的两个社群的观念数占总体观念数的比例。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价值观念更多地集中在少数社群中,网络呈现更加区隔化或同质化的特征。数值越小,则说明价值观念更加分散,网络更加多元化。从时间变化来看,规模最大的两个社群在 1990 年所涵盖的观念数目占总体的近 80%,而在 2007 年后占比下降至 60%左右,该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假设。

2. 社群特征的变化

社群数量以及头部社群占比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均支持了中国人价值观念趋于多

^① 我们同样分析了在控制各个客观变量后,观念网络社群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趋势,结果总体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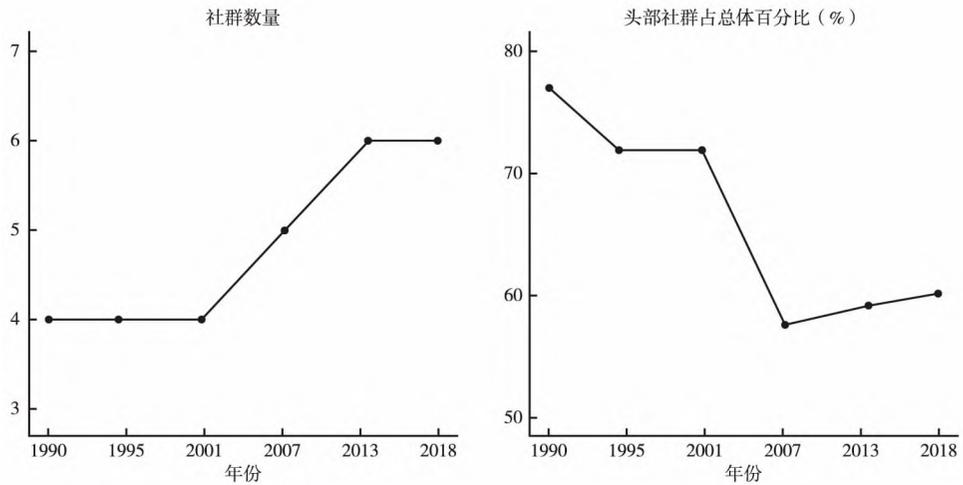


图 1 社群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趋势

元化的假设。图 2 进一步比较了 1990 年和 2018 年观念网络的社群特征。通过这一方式，希望对观念网络进行具体的阐释，以探索多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本文以 1990 年的观念网络作为基点进行解读，继而比较 2018 年与 1990 年观念网络之间的差异。其中，1990 年的观念网络中包含 4 个社群。综合这 4 个社群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我们将这 4 个社群分别命名为“工作与家庭关系观念社群”（圆形节点）、“价值判断观念社群”（五边形节点）、“社会信任观念社群”（三角形节点）和“社会规范观念社群”（正方形节点）。其中，前两个社群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在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方面的选择，后两个社群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看法。4 个社群的分类与现有关于中国人价值观念分类的框架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杨宜音，1998），体现了“个人 VS 集体”“工具性 VS 价值性”两个维度交互下的四种类型。

其中，工作与家庭观念社群主要涵盖人们在工作、收入、家庭、儿童养育等方面的态度倾向，如工作的积极性、育儿的理念等；价值判断观念社群主要涉及人们对各种价值议题的理解，如对于民主、传统、科学的态度；社会信任观念社群主要包含人们对于国家、政府机关、媒体、社区、邻居、公司等对象的信任程度；社会规范观念社群则包括了个人对于社会中各种争议性问题的态度观念，如对于偷税漏税、婚前性行为以及离婚等社会问题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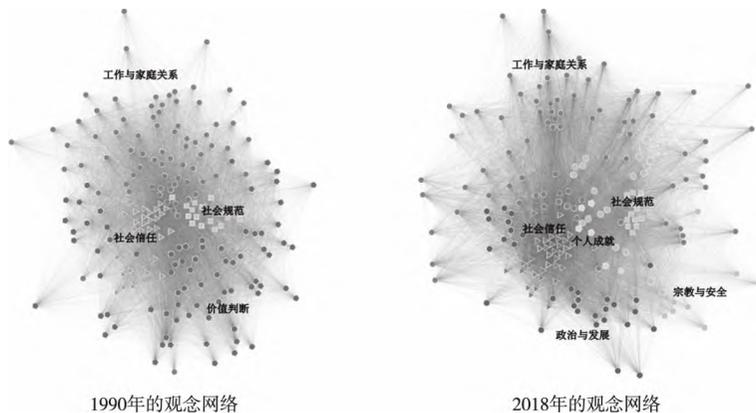


图2 观念网络的变迁(1990—2018)^①

在1990年的观念网络中，价值判断观念社群的比重最大，共包括77个观念，涵盖了人们对于各个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看法。这个社群在2018年的观念网络中发生了分裂，成为3个子社群，分别为“个人成就观念”（五边形节点）、“政治与发展观念”（六边形节点）和“宗教与安全观念”（七边形节点）。个人成就观念子社群主要涵盖了与个人成就相关的各种观念，如对于工作意义的看法；政治与发展观念子社群包含了对政治议题的态度，如对于公共政策、民主政治的判断；宗教与安全观念子社群则主要包括对各种重大社会议题的看法，如对于宗教问题、移民问题和抗争类问题的观点。

价值判断观念社群的分裂说明，中国人的价值偏好越发分散，更少使用统一的逻辑对不同的价值领域进行评判。在1990年，对个人成就的态度与对政治议题的偏好处于同一个观念社群，知其一便知其二；而在2018年，知道个人的政治偏好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其对于个人成就的重视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去政治化与个体化。

需要强调的是，除价值判断观念社群外，工作与家庭观念社群、社会信任观念社群和社会规范观念社群这3个社群在1990至2018年期间并未发生过多的变化。这一结果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存在着较大的稳定成分。中国人对于在家庭和工作中如何行事以及在对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的认知上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共识，在市场转型的进程中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① 如需带标签以及彩色的版本，可向作者索取，作者邮箱为 wu_jf@outlook.com。

(三) 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度

为检验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度,我们以各个结构性变量与每个价值观念之间的皮尔逊系数的绝对值为因变量,重新拟合了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其中,结构性因素与观念的相关系数内嵌于每一对变量对的第二层次中,不同的变量对具有不同的随机截距和时期的随机系数。具体的公式如下:

$$\begin{cases} |r|_{jt} = \beta_{0j} + \beta_{1j}t + \varepsilon_{jt} \\ \beta_{0j} = \gamma_{00} + \mu_{0j} \\ \beta_{1j} = \gamma_{10} + \mu_{1j} \end{cases} \quad (2)$$

其中 j 为客观变量与特定观念的变量对, t 为时期, 进而 $|r|_{jt}$ 表示的是在 t 时期变量对 j 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与前文的模型一致, β_{0j} 与 β_{1j} 为随变量对 j 变化的随机截距与随机系数。 ε_{jt} 为扰动项。

表 3 的结果显示,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与观念间的相关系数有不同的变化趋势。主观阶层与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变化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性别与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减弱,但系数较小。也就是说,主观阶层和性别这两个因素对于价值观念的解释力趋于稳定,有所弱化,依然支持了多元化假设。

但受教育程度的结果则相反。教育与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增大,但系数也较小。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对于价值观念的解释力有所增加,受教育程度可能成为人们价值观念差异的主要来源。但目前系数较小,趋势并不那么明显。这一点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表 3 结构变量与观念的连接强度的多层次混合模型

	阶层地位—观念	性别—观念	教育—观念
固定效应			
截距	.0486 *** (.0024)	.0405 *** (.0018)	.0700 *** (.0029)
时期 (每五年)	-.0005 (.0008)	-.0013* (.0006)	.0028* (.0010)
随机效应 (标准差)			
截距	.0267	.0206	.0344
时期 (每五年)	.0015	.0008	.0053
BIC	-2487.2670	-2898.4420	-2307.4310
样本量	737	737	737

注: (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总结与讨论

(一) 数据结果总结

近些年来,以价值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文化转型视角愈发得到重视,成为理解中国市场转型的重要方面(王俊秀,2014;周晓虹,2011)。已有研究往往只选取了少数价值观念进行分析,本文则使用整体网的分析方法,对价值观念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客观的测量,系统性地检验了已有文献中有关多元化、区隔化或同质化的观点,为理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整体性变化趋势提供了系统性的认识。

具体而言,本文将价值观念视为网络节点,观念之间的连接作为边,利用整体网的分析方法测量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通过对世界价值观1990—2018年的6轮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呈多元化和稳定性并存的特征。多元化主要体现在:观念连接强度减弱、社群数目增加、头部社群的规模占比下降、性别和阶层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对网络结构的解释力下降。稳定性则体现在价值观念中有关工作与家庭的观念、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方面的观念基本保持不变。多元化趋势主要发生在价值判断部分,具体体现为个人成就和政治理念的价值分离。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总体稳定,呈一定的多元化的趋势。

这一结论与已有文献具有一致性。第一,其他学者也发现了中国人在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工作与家庭的价值观念的稳定性。例如,中国人对于工作和家庭的看法和做法在改革过程中的变化不大(Wang,2015;李春玲,2015;周怡,2022),政治信任水平很高且稳定(周怡,2015)。第二,已有文献也发现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势(李路路、王鹏,2018;李路路、王元超,2020),也有学者将这种多元化与个体化、去政治化相联系(Sun & Ryder,2016;Yan,2010;汪晖,2008)。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另外,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差异可能产生观念的区隔化,与现有的研究也具有有一致性。有学者强调,教育的扩张可能导致人们观念的区隔化(Zhang,2020),并将受教育程度视为解释中国人意识形态谱系的重要变量(Pan & Xu,2018)。也有研究指出,教育水平的差异逐渐成为人们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差异的核心来源(黄嘉文,2013;李颖晖,2015)。事实上,这一趋势不仅限于中国,美国的研究也发现高等教育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潮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普通民众在价值观

念上的分裂（Bročić & Miles, 2021），这可能与因教育产生的社交网络封闭性有关（胡荣，2003；田丰、付宇，2020），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需待进一步研究。

除上述的一致性外，整体网的分析结果还整合了已有研究中碎片化的结论。第一，整体网的分析方法可用来测量价值观念的整体变化趋势，避免学者对价值变量的主观筛选对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并可以基于网络的客观测量考察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这比基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价值观念的分析结果更为客观和全面。第二，本文通过对整体观念网络的分析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变化呈稳定性和多元化并存的趋势。多元化仅发生在价值判断这一领域，而主要体现为去政治化，即人们不再使用政治理念评价其他价值议题（如个人成就）。这一趋势既符合后物质主义转型理论的相关判断（Inglehart, 1997），也与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化进程有所呼应（Yan, 2010）。

（二）未来趋势及研究方向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后续的研究者可以继续沿着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在观念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做更多的分析。比如，社会网络的中心度等指标可以反映个别价值观念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性；河流图（River Network）等方法可以计算价值观念网络的具体变迁模式等（Rule et al., 2015）。此外，本文构建观念网络的三个指标也可用于对其他社会趋势的分析。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的局限：首先，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对于结构性因素的测量较为粗糙，因此无法检验户籍、地区等结构性因素对观念网络的影响，也难以对观念网络的变迁机制做出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检验。其次，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仅提供了2007年以后的权重变量，本文未能对多个年份的数据进行加权处理。^①最后，后续研究也可采用不同的社会网络建模规则和相关系数计算方式，完善观念网络的分析方法。以上的这些议题有待后续研究使用更加完善的数据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参考文献：

- 蔡卫平，2008，《传媒同质化现象动因探析》，《当代传播》第3期。
- 高海燕、王鹏、谭康荣，2022，《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① 本文利用后续年份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比较了加权处理与未加权处理的相关系数，并未发现这两种相关系数的显著性的差异。

- 桂勇、黄荣贵, 2020, 《网络撕裂、民粹型民族主义与后疫情时代的网络治理》, 尹晨、沈可编《危机应对与社会治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桂勇、李秀玫、郑雯、黄荣贵, 2015,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 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社会》第5期。
- 韩洪文、田汉族、袁东, 2012, 《我国大学教学模式同质化的表征、原因与对策》, 《教育研究》第9期。
- 贺光烨、吴晓刚, 2015, 《市场化、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收入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胡洁, 2020, 《市场化与当代中国民众的人际信任》, 《社会学评论》第3期。
- 胡荣, 2003, 《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黄嘉文, 2013,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社会》第5期。
- 黄荣贵、吴锦峰、桂勇, 2022, 《网络社会心态: 核心特征、分析视角及研究议题》, 《社会学评论》第3期。
- 计迎春、郑真真, 2018, 《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 《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 李春玲, 2015, 《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 《河北学刊》第3期。
- 2019,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 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 2012, 《“患不均, 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 李路路、王鹏, 2018, 《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李路路、王元超, 2020, 《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 总体倾向和影响机制(2005—2015)》, 《开放时代》第6期。
- 李路路、钟智锋, 2015, 《“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 《开放时代》第1期。
- 李颖晖, 2015, 《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 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 《社会》第1期。
-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 2012,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刘欣、胡安宁, 2016,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 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社会》第4期。
- 刘欣、田丰, 2018, 《社会结构研究40年: 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探索》, 《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闵学勤, 2012, 《市场转型的双重心理后果》,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 孙立平, 2002, 《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 《战略与管理》第2期。
- 孙明, 2009, 《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田丰、付宇, 2020, 《无友不如己者: 城镇化如何影响个人社会资本》, 《社会学评论》第5期。
- 汪晖, 2008, 《去政治化的政治》, 上海: 三联书店。
- 王俊秀, 2014, 《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王正绪, 2012, 《经济社会现代化与大众民主观念在东亚社会的兴起》, 《开放时代》第10期。
- 王正绪、游宇, 2012,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东亚儒家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念的链接》, 《开放时代》第6期。

- 吴愈晓, 2019, 《社会分层与流动》, 张静编《中国社会学四十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许琪、贺光桦、胡洁, 2020,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 2005—2015》, 《社会》第3期。
- 杨明、孟天广、方然, 2011, 《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 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杨宜音, 1998, 《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2006,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张汇泉, 2022, 《后物质主义五十年: 理论变迁及经验趋势》, 《社会学评论》第5期。
- 张书维, 2017,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心理学报》第6期。
- 周庆智, 2017, 《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 《政治学研究》第5期。
- 周晓虹, 2011,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天津社会科学》第6期。
- 2017, 《中国体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怡, 2015, 《信任与公平: 发展语境下的两个中国现实》, 《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 2022, 《厚与薄: 全球化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学术月刊》第10期。
- Alwin, D. F. 2007, *Margins of Error: A Study of Reliability in Survey Measurement*.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 Baldassarri, D. & A. Gelman 2008, "Partisans without Constrain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rends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2).
- Baldassarri, D. & A. Goldberg 2014, "Neither Ideologues Nor Agnostics: Alternative Voters' Belief System in an Age of Partisan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1).
- Blondel, V. D., J. Guillaume, R. Lambiotte & E. Lefebvre 2008, "Fast Unfolding of Communities in Large Network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 and Experiment* 2008(10).
- Boutyline, A. & S. Vaisey 2017, "Belief Network Analysis: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of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5).
- Brocic, M. & A. Miles 2021, "College and the 'Culture War': Assessing Higher Education's Influence On Moral 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6(5).
- DellaPosta, D. 2020, "Pluralistic Collapse: The 'Oil Spill' Model of Mass Opinion Polar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3).
- DiMaggio, P. 2011, "Cultural Networks." In J. Scott & P. J. Carringto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ondon: Sage.
- Huang, R., Y. Gui & X. Sun 2019, "Beyond the Left-Right Spectrum: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Ideologues in China's Weibo Sp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119).
- Hunzaker, M. B. F. & L. Valentino 2019, "Mapping Cultural Schemas: From Theory to Meth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5).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 W. E. Baker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 Liu, H. 2019, *From Cyber-Nationalism to Fandom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Diba Expedit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Lizardo, O. 2017, "Improving Cultural Analysis: Considering Personal Culture in its Declarative and Nondeclarative Mo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2(1).
- Nguyen, M., Y. S. Bin & A. Campbell 2012, "Comparing Online and Offline Self-Disclosure: A Systematic Review."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2).
- Pan, J. & Y. Xu 2018,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0(1).
- Rule, A., J. Cointet & P. S. Bearman 2015, "Lexical Shifts, Substantive Changes, and Continuity in State of the Union Discourse, 1790–2014."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35).
- Smith, N. R., P. N. Zivich, L. M. Frerichs, J. Moody & A. E. Aiello 2020, "A Guide for Choosing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s in Social Network Studies: The Question Alignmen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59(4).
- Sun, J. & A. G. Ryder 2016,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Rapid Modernization: Sociocultural Changes,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 Tian, F. F. & X. Liu 2018, "Gendered Double Embeddedness: Finding Jobs through Networks i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Social Networks* 52.
- Vaisey, S. 2009, "Motivation and Justification: A Dual-Process Model of Culture in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6).
- Wang, Z. 2015, "Socioeconomic Changes and Value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hanges and Continuity 1993–2011." *Asian Journal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3).
- Whyte, M. 2010,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A. X. 2014,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ver a China-as-Superpower Mindset: An Exploratory Charting of Belief Systems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2008–20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 Yan, Y. 2010, "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 Zhang, T. H. 2020, "Political Freedom, Education, and Value Liberalization and Deliber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1981–2014."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9(3).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田丰、王杨聿)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吴锦峰)

责任编辑: 郭云蔚

PAPER

Changes in the Network of Chinese Values (1990—2018)

..... *Tian Feng , Wu Jinfeng & Wang Yangyu* 38

Abstract: To what extent have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changed the values of ordinary people? Most scholars believe values tend to be diversified ,but some worry about polarization or homogenization in response to market transformation. Using data from six waves of World Values Surveys (WVS) from 1990 to 2018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whole network of Chinese values and measures the changing trends of the network of values in three dimensions: strength of belief connections ,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structur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values present the features of diversity and stability. Diversity is reflected in the decreasing strength of belief connection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munities and the decreasing share of head communities , and the constant or even decreasing explanatory power of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class ,on the network structure. However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education level has increased. Stability is reflected in relatively constant Chinese values on work-family relationships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norms ,with only a separation between political ideas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s. From 1990 to now ,Chinese values have been virtually stable ,showing some signs of diversity.

How Did the Medicine—Public Health Integrated Model in Rural Areas Become Formalize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Project

Wu Zhipeng & Yao Zelin 57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 inter-constr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whole chain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s) from production to us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HRs in Town C of Guangzhou ,thereby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digital production. Under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rigid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re specifically ,under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the township hospital established a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formed by nurses. Moreover ,rural doctors in the previous epidemic prevention network automatically became the contracted village doctors for the project due to path dependency and other reasons. There is almost no room for technology revision by township hospitals and village clinics ,which are at the lowest end of the spectrum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medicine—public health integrated model has been in the dilemma of formalized oper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the rural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ICT application to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equal delivery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s.

How Did Franchise Entrepreneurs Become Franchise Workers? A Study on the Atypical Labor in Small Franchise Restaurant Business

Wang Yuwen & Wang Maofu 76

Abstract: In the era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joining a franchise business has become a career choice